# 从地理学著作的编撰看晚清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郭双林

In the process of spreading modern Western democratic thought in late Qing China, the study of geography beca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his essay primarily examines the different kinds of geographical works compiled at that tim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udy of geography and the spread of modern western democratic thought in China. It also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and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Western democratic thought during the late Qing.

在晚清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东传过程中，似乎是了不相关的地理学研究曾起到过重要作用。当时编撰的各种地理学著作，竟成为西方近代民主思想东传的重要途径之一。这看起来不大可能，但却是事实。晚清编撰的各种地理著作为数甚多，在一篇文章中不可能都涉及到，本文仅拟通过对道咸年间编译的世界地理著作、同光年间撰写的出使游记和光宣年间编写的新式地理教科书的考察，来探讨晚清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情况。

## 一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晚清道咸年间是以“开眼看世界”为时代特点的，而这一时代特点的标志之一，则是《四洲志》、《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海国四说》等世界地理著作的问世。在上述著作中，除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状况外，还首次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国的民主制度，传播了民主思想。

诸书所介绍的有关西方民主制度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议会制度。议会制度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鸦片战争时期编译的几部世界地理著作在介绍欧美各国国政时，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其议会制度。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论及英国国政时就介绍了英国议会的构成、上下议院的权限等，指出：“英国之制……都城有一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贵族院），一曰乡民房（平民院）。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稣教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其民间有利病欲兴除者，先陈说于乡绅房，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议，可行则上之相而闻于王，否则报罢……大约刑赏、征伐、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税课，筹办帑饷，则全由乡绅主议。”[①]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不仅介绍了英国议会（巴厘满衙门，即 parliament ）的职能、权限，尤为详细地介绍了美国议院的构成、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职权及其开会办法。对其构成，书中写道：美国“设衮额里士衙门（Congress，即议院）一所，司国中法令之事，分列二等。一曰西业（Senate，即参议院），

一曰里勃里先好司（House of Representatives，即众议院）。”对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任期及职权，书中写道：“西业执事者曰西那多（Senator，即参议员），每部落公举二人承充，六年更代。所举之人，必居首区九年，而年至三十者方为合例。专司法律审判词讼，如遇军国重事，其权固操之勃列西领（president，即总统），亦必由西那多议允施行。”“在里勃里先好司执事者曰特底甫（Representative，即众议员），由各部核计四万七千七百人中公举一人承充，二年更易。所举之人，须居首区十年，并需年至二十五岁者方为合例……立士碧（Speaker of a Legislative body，即议长）一人，总司其事。”凡国中征收钱粮税饷，官府词讼，议员均可稽核审理。对参众两院议员的集议办法，书中又写道：每年十二月第一礼拜日，参众两院议员齐集会议，或加减赋税，或国用不足，商议贷诸他国本国，或议贸易如何兴旺……若遇仓猝事宜，则随机应变，不受此例限制。[②]以上内容，均在1789年的美国宪法有明确规定，尽管魏源等人当时不知道这一点。

第二，美国总统制度。总统制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鸦片战争时期编译的世界地理著作对此也作了详细介绍。对美国总统的设置和职权，《海国图志》中写道：美国无国王，仅“设勃列西领（总统）一人，综理全国兵刑赋税、官吏黜陟。凡军国重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必与西业（即参议院）会议而后行。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外调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询谋佥同。”“设立副勃列西领一人，即衮额里士衙门西业（即议会参议院）之首领。若勃列西领遇有事故，或因事出国，即以副勃列西领代理。”[③]徐继畬在《瀛环考略》中还介绍了美国总统制度的起源：“兀兴腾（华盛顿）既得米利坚之地，与众议曰：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分其地为二十六部，每部以正统领一，副统领一……二十六部正统领之中，又推一总统领，居于京城，专主会盟战伐之事，各部皆听命。”[④]对总统的任期，《海国图志》中写道：“定例勃列西领以四年为一任，期满更代，如综理允协，通国悦服，有再留一任者，总无世袭终身之事。”[⑤]对总统的选举办法，《海国图志》中又写道：“至公举之例，由各部落人民公举，曰依力多（elect，即选举）。经各部落官府详定，送衮额里士衙门核定人数，与西业之西那多里勃里先特底甫官额相若。各自保举一人，暗书弥封，存贮公所，俟俟齐发，以推荐最多者入选。如果有官举无民举，彼此发生争执，则由参议院议长于众人所举之中拣送选票最多者三人，“仍由各依力多（elector，即选民）就三择一”，膺斯重任。被选举人“首重于育奈士迭国（即 the United states）中，尤必居住首区历十四年之久，而年愈三十五岁方为合例，否则不入选。”[⑥]《海国四说》和《瀛环志略》等书中对此也有类似记载。

第三，司法独立制度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司法独立制度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编译的世界地理著作对此亦有比较详细介绍。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谈到美国的司法制度时写道：“国都有一察院，院内共七人，以每年正月齐集，究人因何不遵法律之故。审毕或三月，然后回家。其各部亦分七院，每年以四季齐集不守例者。审问官则不能会议制例，会议制例官则不能兼摄审也。”书中还介绍了美国的五种法律，即国例、部落例、府例、县例及司例。在此五例中，又“小不能犯大”。书中还列举了美国的十四条大典（疑是美国宪法的内容），指出：“除此例外，首领亦不能任意自为。凡统领遇馈送当爱者，亦必商之议事阁及选议处，使大小文武皆得仿行。国人以律例为重，不徒以统领为尊。”《海国图志》中还介绍了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美）国之大政有三：一则会议制例，二则谕众恪遵，三则究问其不遵者。”[⑦]

最后，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当时这些著作的大部分作者在书中对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了仰慕与叹羡之情。《四洲志》中写道：美国“虽不立国王，仅设总领，而国政操诸舆论，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闻，事简政速，令行禁止，与贤辟所治无异，此又变封建郡县官家之局者也。”[8]魏源不仅将这些话原原本本辑入《海国图志》中，而且进一步发挥道：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9]以后他在修订该书时进一步指出：“至墨利加北洲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10]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也以赞赏的口吻写道：“弥利坚合众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诸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他还高度赞扬了美国民主共和制度的缔造者华盛顿，称其为“异人”、“人杰”[11]。梁廷楠在《海国四说》中也指出了美国民主共和制度与封建专制制度的不同，说了解美国后才知“可畏非民”的古训“未为虚语”[12]。

由上可以看出，当时编译的世界地理著作除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外，起码还向人们传递了以下两条信息：第一，西方各国的民主制度，特别是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与当时中国实行的“封建郡县官家之局”根本不同，这是一种古今未有的新制度。第二，这种古今未有的新制度比中国的“封建郡县官家之局”要优越得多，与人们常常憧憬的唐禹三代的大同之世颇为相似。

当然，对西方民主共和制度的叹羡，固然说明当时编译世界地理著作的人们在思想上已经对中国实行的封建专制制度有某种程度的不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主张把西方各国的民主制度引进中国。如梁廷楠在《合省国说》中虽然详细介绍了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但接下去他却写道：“虽然，是必美利坚之地、之时、之人而后可。”为什么呢？他对此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结论：“以是观之，地既有所凭恃以自立，时又迫之不遑他计，而人人复安于愚贱，泯争端，三者相乘，夫是以创一开辟未有之局，而俨然无恙，以迄于今也。”[13]言外之意，这种政治制度好是好，但除美国外，其他地方根本行不通。

早在鸦片战争前，一些涉及域外情况的地理学著作就对西方近代民主制度有零星的介绍[14]，但这类记载在当时极为少见，也非常简略。晚清首次比较系统地向国内介绍西方各国民主制度的著作是鸦片战争时期编译的这一批世界地理著作。这对当时国人“开”眼看世界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当然，这种介绍在当时毕竟是初步的，许多人对美国民主共和制度的看法也明显带有理想成份。这说明，包括林则徐、魏源、徐继畲、梁廷楠等人在内的“先进的中国人”在当时的觉醒程度还十分有限。

## 二

同光年间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时代。当然，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有这个条件，当时能够真正走出国门的，仅仅是一些出使、游历人员和少数留学生。根据清政府制定的《出洋游历章程》，当时各出洋人员均负有一项特殊使命，即撰写游历日记，抄送总理衙门，以备刊刻。也惟其如此，这些出使游记也就具有了特殊的价值。同光年间西方近代民主思想部分就是通过撰写刊刻这些游记传入中国的。当时就某一部游记来说，其内容固然显得分散、零乱，但若把这些著作略加梳理，不难发现，它们对近代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绍，已经非常系统，不论

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看，都要远远超过道咸年间编译的世界地理著作。

当时这些游记所介绍的西方近代民主制度的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议会制度。对此，道咸年间编译的世界地理著作都作过不同程度的介绍，但毕竟处在“开”眼看世界时代，诸书作者均未到过外国，只能“以西洋谭西洋”。因此，相对来说，书中所记比较简单，甚至有许多错误。同光年间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当时几乎所有的出使游记的作者都对西方各国的议会制度作过认真的考察，许多人还旁听了所在国议会的辩论，因此他们的记载，较之道咸年间编译的世界地理著作，就不仅要详细、生动得多，而且要深刻得多。张德彝在《使英杂记》中就详细记载了英国议会上下两院议员的构成、选举原则及其职能，指出：“总之，凡事绅主之，官成之，国君统之而已。”[15]薛福成在出使日记中则详细考察了西方议会制度的起源及上下议院与君权的相互制约作用，认为：“泰西诸大国，俄罗斯外，无不有议院，实沿罗马之遗制也……议院者，所以通君民之情也。凡议政，以协民心为本。大约下议院之权，与上议院相维制；上下议院之权，与君权相权相维制。”[16]李圭在《环游地球新录》中甚至不惜笔墨，详细介绍了英国议院的位址、建筑结构及其开会情形。

这些出使游记的作者在介绍西方各国的议会制度时也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如宋育仁在《泰西各国采风记》中就写道：“政非议不成，议非众不公，而民政不能按户而说，执途而语。故由民举其能者贤者，代民达隐，陈其所利，除其所害。故议院为欧洲近二百年振兴根本。自有议院，而君不能黩武、暴敛、逞刑、抑人才、进佞幸；官不能怙权固位，枉法营私，病民蠹国。故风行景从，不崇朝而遍欧美。议院为其国国政之所在，即其国本之所在。”[17]薛福成在其出使日记中也写道：“西洋各国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18]甚至连以保守闻名的刘锡鸿在旁听英国议会辩论后也在《英轺私记》中写道：“盖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令，斯力无不惮也。”[19]许多人如崔国因、王韬、薛福成等人还在游记之外公开主张在中国设立议院。

许多出使人员在游记中对西方各国议会制度的弊端也作了不同程度的揭露。张德彝在《欧美环游记》中就写道：“刻下英国包举公行，例应荐者，皆有倖进之心。竟有具帖挽人保荐，约定俸银若干，以酬其劳。是大公无我之权，变为假公济私之举矣。更有于公举之数月前，设法愚弄其民，如济贫扶困诸仁政，一一举行，以便牢笼人心，俟公举时自然口碑载道。是乡举里选之政，适资沽名钓誉之私矣。”[20]稍后，薛福成也在出使日记中对西方各主要国家的议会制度进行了分析、比较，认为“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英国虽然比较“斟酌适中”，“然至今推选议员，亦隐蔽丛生。一则植私党以广扶持，一则散财货以延虚誉也。”[21]当然利弊相较，他们仍认为利大于弊。

第二，政党政治。道咸年间编译的世界地理著作，对西方各国议会制度的介绍很多，但均未提到政党政治。据笔者所见，晚清最先提到西方政党政治的地理学著作，是张德彝的《欧美环游记》，其中写道：“闻（美）国人自北方胜后，而南方时有不逞之心，乃聚众立党，称为‘分尊卑党’。仍以奴辈视黑人，只于不敢放肆。所有大小官僚，仍系‘平行’，与‘分尊卑’二党并进，各怀私意，彼此不睦。现任伯尔玺天德将及四载，各邦人民公举党中二大官为一正一副。因二党不和，‘平行’者欲举二人，一名戈兰德，一名寇法斯；‘分尊卑’者欲举二人，一名希墨，一名布蕾。”[22]

以后随着人们对西方各国了解的加深，各种出使游记中关于欧美政党政治的记载也越来

越多。薛福成在出使日记中就写道："英国有公保两党，公党退，则保党之魁起为宰相；保党退，则公党之魁起为宰相。两党互为进退，而国政张弛之道以成。然其人性情稍静，其议论亦较持平，所以两党攻讦之风，尚不甚炽，而任事者亦稍能久于其任。法国有左中右三党，而三党中，所分小党甚多。又有群党民党之别。其人皆负气好争，往往嚣然不靖。"[23]

不过，在对待政党政治的态度上，各出使人员在游记中流露出的态度与其对待议会政治的态度截然不同。张德彝在《欧美环游记》中介绍美国的政党政治时就认为："二党如此争衡，后患恐不免焉。"[24]薛福成在出使日记中对西方政党政治也明显持否定态度。长期驻外的黄遵宪在其编著的《日本国志》中甚至写道：西方政党政治"譬之汉唐宋明之党祸，不啻十百千倍。"[25]只有黎庶昌在《西洋杂志》中对此看法比较客观，他认为："西洋朋党最甚。无论何国，其各部大臣及议院绅士，皆显然别为两党，相沿成风，进则俱进，退则俱退，而于国事无伤，与中国党祸绝异。"[26]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应该说是黎庶昌比其他人高明的地方。

同光年间撰写的各种出使游记在介绍西方各国政党政治时，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未发现任何人在游记中公开主张在中国实行政党政治，这与当时人们强烈要求在中国设立议院的现象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由于中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都曾对结党者予以严厉打击，汉之党锢，唐之党争，宋之党禁，明之党祸，常常使广大知识分子思之不寒而栗。明清时期，统治阶级更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严禁结党，所以尽管西方近代政党与中国历史上的朋党根本不同，在当时仍不免谈党色变，抨击之尚唯恐不力，岂敢再主张结党。二是当时西方各国的政党政治的确存在许多问题，如前面提到的英国选举时愚弄选民、贿赂公行，法国君民二党"狺狺相争"，政潮频起，德国俾斯麦利用同党，专横跋扈等，也使人们对其持保留的态度。

第三，司法独立制度及主要法律原则。法律至高无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西方近代民主国家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鸦片战争时期编译的几部世界地理著作虽然对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作了简要介绍，但因囿于所见，对其基本的法律原则却未论及。同光年间许多出使、游历人员通过对所在国进行实地考察，对各国的司法制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因此，在他们的游记中，除了介绍其司法制度外，还涉及到一些法律思想和法律原则。刘锡鸿在参观英国公审之后，便在《英轺私记》中写道："（英国）刑司之权，足以讯治及国主王公大臣，故英伦有君主不尊律例为尊之语。"[27]张德彝在《随使英俄记》中也留下了同样的记载。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光年间出使人员在其游记中介绍西方各国政治制度时，并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们除详细介绍了欧美各国的议会制度、政党政治和司法制度外，还对各国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比较、分析和评判。薛福成在出使日记中就写道："地球万国内治之法，不外三端：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凡称皇帝者，皆有君主之全权于其国也。中国而外，有俄、德、奥、土、日本五国，巴西前亦称皇帝，而今改为民主矣。美洲各国及瑞士与法国，皆民主之国也。其政权全在议院，而伯理玺天德（译作总统）无权焉。欧洲之英、荷、比、西、葡、丹、瑞典诸国，君民共主之国也。其政权亦在议院，大约民权十之七八，君权十之二三。"[28]在对待近代西方各国君主、民主和君民共主三种政治体制的态度上，道咸年间编译世界地理著作的人们对美国、瑞士的民主共和制度最感兴趣，不仅热情赞颂，而且加入了许多理想化成分。对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仅仅是客观介绍，很少有人作过评价。同光年间出使、游历人员通过对所在国的政治制度进行考察后，在游记中介绍西方各国政治体制时，态度开始发生变化。总的来说，当时除个别人外，大多数

人对民主共和制度，特别是法国的民主共和制度持否定态度，而对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制度予以充分地肯定。薛福成在其出使日记中就对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政治体制的得失利弊进行了分析比较，认为："夫君民共主，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29]崔国因、王韬、黄遵宪等人在其地理著述之外要求开设议院时，也仅是要求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而不是民主共和制度。

总的看来，同光年间，随着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人们（主要是出使、游历的外交人员）在其出使游记中介绍西方近代地理学知识时，同时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国近代的民主制度，传播了民主思想。就内容上来看，这一时期出使游记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绍，较之道咸年间，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较大的进展。这反映出当时中国人民觉醒程度的不断提高。

## 三

光宣年间是民主思潮风行的时代，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不仅频频发动武装起义，而且编译著作，出版报刊，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立宪派要求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的呼声也日高一日。不过，真正将西方近代民主思想普及到"寻常百姓家"者，乃是当时编译的各种地理、历史教科书。

与道咸、同光年间的地理著作和出使游记相比，由于受著作体例的限制，加之清朝统治者的压制和破坏[30]，光宣年间编写的各种地理学教科书在介绍西方近代民主制度、民主思想方面，虽然比较浅显，但内容还是很丰富的，且颇有特色。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除文字介绍外，运用各种表格系统介绍当时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治体制，使人一目了然。光宣年间许多地理学教科书在介绍世界各国的政治体制时，除运用文字介绍外，还广泛运用了各类表格，将当时世界各国的政治体制列为图表，使人一目了然。1902 年上海作新社编印的《世界地理》，在总论各国政治体制时先用文字介绍道："今世界所行之政体有二：君主政治及民主政治是也。君主政治，乃君主在上统治一国。其中亦分为二种：即专制君主制和立宪君主制也。民主政治，则以国民所选举之代议士，办理国政，其行政部之长，称曰大总统。"[31]接着又将当时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体与首府所在地列表如下（表见下页）。

实行君主立宪或民主政体的国家则富强，实行专制政体的国家则贫弱，从表中一览便知。同时的其它地理学教科书，如谢洪赉的《瀛环全志》、刘鸿钧的《政治地理学》在介绍当时世界各国的政治体制时，都曾列表予以说明。

第二，在介绍世界各国政治概况时，从政治体制入手，旁及其他各种政治制度。谢洪赉在《瀛环全志》中写道："政体者，执政权之组织也。因国体而异。主权在君者，曰君主政体；主权在民者，曰民主政体。君主政体有二：一曰专制政体，君主一人，独裁万机，威权无限，刑赏由己。今俄国等是也。一曰立宪政体（或曰君民共主），君虽世及，常居高位，而其发政施令，必不能逾已定之宪法，刑戮不及无辜，税敛不由私利。今文明国皆然。民主政体（或曰共和），公举总统，本宪法而行主权，大事进退，听命于议院。总统之位，以时更易。今美、法等国是也。"[32]在论及瑞士的国政时又写道："（瑞士）前为数小国，自千八百四十八年，合成一同盟民主国。立法权归国会。有上下二院。上院议员四十四，由全国二十州各举二人；下院议员一百四十五，由两万人员中选举一人，任期三年。行政权在国会所举

| 国名 | 政体 | 首府 |
| --- | --- | --- |
| 中国 | 专制 | 北京 |
| 日本 | 立宪 | 东京 |
| 朝鲜 | 专制 | 汉城 |
| 英吉利 | 立宪 | 伦敦 |
| 法兰西 | 民主 | 巴黎 |
| 俄罗斯 | 专制 | 圣彼得堡 |
| 德意志 | 立宪 | 柏灵 |
| 奥地利匈牙利 | 立宪 | 维也纳 |
| 意大利 | 立宪 | 罗马 |
| 西班牙 | 立宪 | 马德里德 |
| 土耳其 | 专制 | 孔士坦丁 |
| 北亚美利加合众国 | 民主 | 华盛顿 |

之行政院议员七人，其长即为国之总统、副总统。每年一选，不得再任。其议员即为各部长官，分司庶政。各州皆有政府，有自治立法之权，其制不一。"[33]其他各种地理学教科书对世界各国政治体制的介绍，虽不及以上详细，但均涉及到各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包括议会制度、政党政治、内阁制、总统制及司法制度等。

第三，充分肯定宪法在民主和立宪君主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光宣年间以前编撰的地理学著作在论及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时，虽然也曾涉及到一些立宪国家宪法的内容，但无人提到宪法。光宣年间编写的各种地理学教科书，不仅频频提到宪法，而且充分肯定了宪法在立宪国家的地位和作用。谷钟秀在其编译的《统合万国地理》中写道："国家有种种之政体，大别为三：第一，君主独裁万机，称专制君主国……第二，君主为单独之主权者，循一定之宪章，总揽万机。或君主不过主权之一部，万机皆依宪章所规定各机关执行之。此等通常共称君主立宪国……第三，国民之集合体为主权者，依一定之国宪，管理其机关之行动，称民主国（共和国）。"[34]谢洪赉在《瀛环全志》中介绍日本的政体时也特别指出：明治天皇即位以后，三十一年（1899）"颁定宪法，改政体为立宪政体，即现行之宪法也。皇位世袭，掌统治全国之权。惟一切法令，必遵宪法，不得以己之意擅有更改。"[35]在近代东西方各国，从议会机构的设置到宪法的制定，标志着各国宪政的最后确立。在晚清的中国，人们对西方近代民主制度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由重视议会制度到重视宪法这样一个过程。这反映出中国人民对西方近代民主制度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第四，将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学说融于一般地理学知识中予以介绍。晚清编译出版的各种地理学教科书在介绍各国政治概况时，基本上都是循着立法、行政、司法的顺序，分三个方面来介绍的。吴启孙在所译矢津昌永的《世界地理学》中论及日本的政制时便写道："（日

本）政制分立法、行政、司法三部。立法部为帝国议会，有贵族公议两院，国中法律，悉由议会协定颁布……行政部，内阁总理大臣为首，其下内务、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司法、文部、农商部、递信凡九省，皆有大臣总务长官……司法部以司法官组织，最高曰大审院，其下有东京、大坂、名古屋、广岛、长崎、宫城、函馆七控诉院，各府县有地方裁判所。”[36]这种叙述方法的确定，显然受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的影响，这些教科书的流传，则又将其思想普及到中小学生中间。胶州湾世界语言文学研究会编辑部译述的《人生地理学》在论及国家的职能与目的时，还特别强调了国家对“确保个人之自由活动，即保护其个人之权利”的职能，书中写道：“是实近世文明国所明认为国家活动之一而为受服从法律注意之薰陶之国民所当独得者也。其方面有二：一对于国民相互间所生之妨害，认个人之权利保护其自由；一对于国家自身之发动机关的政府之侵害，认个人之权利为神圣之自由，不仅使其不可侵，对于个人而保护其政治的权利（参政权）。”这两种权利是通过宪法的制定来强制实行的，而“良心之自由、思想之自由、言论之自由、言语之自由、宗教之自由，及为政治、宗教教育之目的，个人结社之认可等，”[37]则为其主要内容。这里与其说是在介绍西方近代地理学知识，勿宁说是在宣传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民权学说。

在当时编写的地理学教科书中，有些还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刘鸿钧在其编写的《政治地理学》一书中就比较深入地探讨了近代国家的概念、分类以及政体的差别。对于国家的起源，他写道：“人群团体之结合，其始必源于夫妇，由夫妇而生子，即成家族，有家族则社会萌芽起焉。继由家族发达，集成亲族。更由亲族而膨胀之，蔓延不已，支派日出，遂不复记其家族之关系，而民族之势成。夫所谓民族者，以其言语、风俗、习惯、宗教之相同也。有种种同一之观念，即不得不有共同之生活，欲得生活之根据，又不得不有一定之土地，既有土地，复有一民族或数民族共戴一主权之国体，于是乎成立为一国家。”他进而给国家下了一个定义：“国家者，以一定之土地与一定之人民，而有独立统一之主权以统治之团体也。”[38]很明显，这是一种近代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他从政体和国体两方面对国家进行了分类：“国体上分类则有君主国体及共和国体。而共和国体，更得分为贵族国体及民主国体。所谓君主国体者，谓以一人而占国法上最高地位也。若二人以上，则为共和国体。又共和国体中所谓贵族国体者，谓占最高地位而有特别阶级也。若属之普通人民占有者，则为民主政体。”政体上分类则“但问其宪法有无而已。有则为立宪政体，无则为专制政体。立宪政体者，国家机关上行动，均有一定之规则也；专制政体者，国家机关上总揽，均由于一人专断也。”[39]对于国家政体的差别，他认为“由其观察点之异”可以分为两类：“一以主权为标准，一以元首为标准。”如果以元首为标准，则可分为君主政体、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君主政体者，主权握自君主也，以君主一人，总揽国权，别无独立机关以参与之，是为君主专制政体。以君主一人执行国权，复设独立机关以限制之，是为立宪君主政体。”民主政体也可分为两种，即直接民主政体与代议民主政体。“直接民主政体者由全体人民直接而组织为主权总揽之合议体也……代议民主政体者，由人民选举而得有资格者，相合而成为主权总揽之一体也。”至于贵族政体，则是“国法上最高地位归一种特别阶级之少数人民占有者”。如果以元首为标准，则可分为独任政体与合议政体。“独任政体者，国权专属于元首也。然元首亦不无限制，于道德上则尽负责任。但法律上有不负责任之元首，有负责任之元首。负责任，则为独任共和政体；不负责任，即为独任君主政体。”独任君主政体又可分为专制独任君主政体与立宪独任君主政体。合议政体也有两种：“一由议会选举代表人，

以执最高之机关者，谓之合议君主政体；一由议会全体，直接以掌组织之机关者，谓之合议共和政体。此二者之外，更有以一人为最高机关，而其主权究由帝国内之各组合国主之，以宪法制限其主权之行使，谓之立宪合议君主政体。”[40]刘鸿钧在其书中谈论的这一套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学说，本身就是对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宣传。

当时人们在介绍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及其思想学说时，并非无动于衷，机械地谈论，而是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一般说来，他们对立宪君主专制政体评价甚高，对君主专制政体不无微词，对民主共和制度则多持保留态度。谢洪赉在《瀛环全志》中就指出：实行君主立宪者均为文明国。[41]谷钟秀在其书中也写道：“欧罗巴诸大国中，专制政体仅露西亚，而亚细亚诸国中，立宪政体仅有日本。”[42]褒贬之意，甚为明显。当时人们在介绍东西方各立宪国家时，对英国、日本肯定得最多。谢洪赉在其书中就指出，日本为亚洲“独一立宪之国”。在论及英国的政治制度时又肯定其“实为举世首创君民共主之立宪政体也”。[43]在各专制君主国家中人们非议最多的是俄国和中国。当时几乎所有的人在举专制君主政体的例子时，都把俄国和中国作为代表。刘鸿钧在介绍俄国的政体时更直接了当地指出：“俄罗斯帝国，专制君主国也，无宪法，无议会，立法行政二权，悉皇帝主之。”[44]作新社在其编印的《世界地理》中论及中国的政体时则写道：“其政体系君主专制，为皇帝所独裁……其法律悉照《大清会典》所定者而行，其实此书不过朝廷之法规类纂，不得谓之真法律也。”[45]当然，在清政府严格的教科书审查制度下，作为当时各新式学堂使用的地理学教科书，不可能象革命党人撰写的战斗檄文那样，大肆颂扬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思想学说，无情地揭露清朝反动统治的黑暗、腐朽，而只能如上文所说的那样，比较客观地将西方近代民主制度和思想学说介绍给每一位读者，这对造成立宪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的声势虽然作用不大，但对扩大、巩固其社会基础，却具有重大的意义。

## 四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在中国传统思想宝库中，虽然有着丰富的民本思想，但作为近代新文化主体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却是从西方传入的。在晚清西方近代民主思想东传过程中，似乎是了不相关的地理学研究曾起到重要作用。当时除个别自然地理学著作外，一般都对所述各地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有所涉及。至于人文地理著作，对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的介绍则更加详细。这些著作的流传，本身就是对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传播。

第二，从横的方面看，由于受著作体例的限制，晚清通过地理学著作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内容，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也包括一些理论和思想学说，诸如议会制度、总统制、司法独立制度、政党政治以及三权分立原则、宪法思想、国家学说等。

第三，从纵的方面看，晚清通过编撰的地理学著作东传的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内容上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深到浅的发展过程。从编撰者的思想倾向上看，则经历了一个由憧憬美国、瑞士式的民主共和制度到向往英国、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度的过程。当时很少有教科书公开赞颂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这种与高涨的民主革命运动的背离，主要是由教科书的特点、清政府的教科书审查制度和高涨的立宪运动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从其影响上看，则呈现出一种逐渐减弱的趋势。具体说来，如果说道咸年间人们是通过当时编撰的几部世界地

理学著作来“开”眼看世界、来了解西方民主制度的话，那么同光年间由于其他西学著作的编译出版，当时撰写的出使游记只能说是人们认识、了解西方的一个重要渠道，至于光宣年间编写的地理教科书在传播西方近代民主思想方面，则无法与当时涌现的各种政治学著作相提并论。但它们在普及民主思想方面，还是起到了其他政治学著作无可替代的作用。

第四，由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晚清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传播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为了方便起见，用几本政治学著作、几个历史人物为代表来勾勒其概貌固然无可厚非，但如果以为这便是近代西方民主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全貌，则大错特错。事实上，晚清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东传是一个持续的、复杂的、全方位的渗透过程，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是历史的必然，绝不仅仅是几个人的功劳。当然，先驱者的历史功绩是永远值得纪念的。推而广之，对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也可作如是观。

---

①⑪徐继畬：《瀛环志略》卷7。
②③⑤⑥⑦⑧⑨魏源：《海国图志》(60卷本)，卷39。
④徐继畬：《瀛环考略》，第208－210页，文海出版公司版。
⑩魏源：《海国图志》(百卷本)，《后叙》。
⑫⑬梁廷楠：《合省国说》，见《海国四说》之二，中华书局1993年出版。
⑭叶钟进：《英吉利夷情纪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12帙。
⑮张德彝：《使英杂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1帙，第296－297页。
⑯⑱㉑㉓㉘㉙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第515、197、618、515、286、536－538页。《走向世界丛书》第1辑第8册。
⑰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第5页，《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11帙。
⑲㉗刘锡鸿：《英轺私记》，第83、136页，《走向世界丛书》第1辑第8册。
⑳㉒㉔张德彝：《欧美环游记》，第714、694、714页，《走向世界丛书》第1辑第1册。
㉕黄遵宪：《日本国志·礼俗志四》。
㉖黎庶昌：《西洋杂志》，第426页，《走向世界丛书》第1辑第6册。
㉚如管学大臣张百熙在1902年2月3日所上的《奏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中强调京师大学堂内宜设译局翻译外国教科书时就指出：“惟其中有与中国风气不同及牵涉教宗之处，亦应增删润色，损益得中。”(《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7页）同年10月3日，张之洞在所上《筹定学堂规模次第举办折》中也特别强调要慎重选择外国教科书，他还提出了修改外国教科书的三种方法，即义类、名词、文法。具体到地理学教科书方面，他主张“详内而略外”，即尽可能使学生少了解国外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思想学说（《张文襄公全集》卷57)。同时学部还建立了严格的教科书审查制度。
㉛㊺上海作新社编印：《世界地理学》，第6－8、78页，1904年第7版。
㉜㉝㉟㊶㊸㊻谢洪赉：《瀛环全志》，第32－33、352、160、33、51、33页，190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㉞㊷谷钟秀译述：《统合外国地理》，第117、8页，1907年河北译书铅印。
㊱矢津昌永著、吴启孙译：《世界地理学》，第23－27页，明治35年丸善株式会社发行。
㊲胶州湾世界语言文字研究会编译部译述：《人生地理学》，第110－111页，1907年上海游艺社再版。
㊳㊴㊵㊹刘鸿钧：《政治地理学》，第1－2、7－8、11－14、107页，1905年湖北法政编译部编印。

（作者郭双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邮编100872）